

# 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

李树辉

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阿克苏等地区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摩尼教消亡的时间约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此前，有关维吾尔族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伊斯兰化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关键词：喀什噶尔 叶尔羌 阿克苏 《大霍加传》

作者李树辉，1957年生，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 一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mānī）于3世纪中叶创立的宗教。摩尼教曾盛极一时，遍及中亚、西亚、南欧、北非各地，但好景不长。瓦拉姆一世（274～277年）登位后，先是处死摩尼，接着是对摩尼教徒的残害。在西方，摩尼教只能混迹于基督教异端之中，日益销声匿迹了。在中亚，摩尼教也早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705年，倭马亚王朝将屈底波（Kutayba ibn Muslim el-Bahili）派往谋夫接任呼罗珊（Khurasan）总督。他任职期间（705～715），大食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达到全盛，征战由以前的Salaha“讲和”（伴以大量地索取赔款）转入fataha“攻克”<sup>①</sup>。此后，由伊斯兰化的伊朗人建立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进而向北挺进，于8世纪上半叶将势力扩展至恒逻私河、楚河流域，逐步确立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这期间，无论是倭马亚王朝的征服者，还是阿拔斯王朝的征服者，都采用种种残暴手段，强迫被征服地的人民改信伊斯兰教。当地的摩尼教徒、佛教徒、祆教徒和景教徒为避免迫害而纷纷东逃。这场席卷粟特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东传的原因所在<sup>②</sup>。

伊斯兰教的东进，对于中亚的摩尼教来说，无疑是场没顶之灾。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促成了该教在东方的复兴。摩尼教于牟羽可汗在位期间的宝应二年（763）正式传入回鹘。《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第4～8行称：

子 爱登里罗汨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苾伽可汗（即牟羽可汗——引者注）继承，英伟杰特异常。宇内□□，诸邦钦伏。洎大唐玄宗帝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逞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前驱，克复京洛。皇帝与回纥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舅甥

<sup>①</sup>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sup>②</sup> 李树辉：《唐代粟特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之国。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俗败民弗/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况法师妙达名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以茹荤屏湮酪为法，立大功绩，乃曰汝僊悉德。于时都督刺史、内外宰相、司马金/曰，今悔前非，愿事正教。奉旨宜示，此法微妙，难可受持。再三恳恻：往者无识，谓鬼为佛；今已误真，不可复事。特望□□□□□曰，既有志诚，任即持贲，应有刻画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并摈斥/而受明教。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圣人之在上，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诚。□□□□德(愿)领诸僧尼，入国阐扬。自后(道?)□慕闍徒众，东西循环，往来教化。

此段碑文讲述的是天宝十四载(755年)，唐与回纥联军收复两京后，回纥与摩尼师四人归国之事。回纥军第二次入东京的时间在宝应元年(762)十月。当时，回纥曾放兵劫掠，而朔方神策军亦乘机掠夺三月，以致于“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回纥军归国的时间，亦即摩尼教正式传入回鹘的时间，当在宝应二年(763年，该年七月壬子改元广德)春夏之季。在班格(W. Bang)和葛玛丽(von Gabain)刊布的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文写本残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uluḅ baḡlaḅ ātlīḅ jīl-nīḡ ikkinti jīlīnta nomī dini  
jadīlmīḡta · tavḡatḡ elintin · jana.....

在被称为“上元”的第二年，在其教理、宗教流传时，从桃花石国又.....

“上元”是唐肃宗的年号，乾元三年(760)闰四月己卯改元“上元”。二年九月壬寅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敦煌文献P. 2810bv《唐开元九年(721)至贞元四年(788)大事记》亦记称，上元二年改“十一月三日斗为建，子月为岁”。所记亦相吻合。此后，在回鹘汗国的支持下，摩尼教徒在中国内地广建寺院，四处活动。《佛祖统纪》卷四一：“大历三年(768)，敕回纥奉摩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并见同书卷五四，《僧史略》卷下)自宝应二年(763)至大历三年(768)的六年间，摩尼师竟能左右可汗，藉政治势力而要挟唐朝为之建寺。足见其发展之快。

牟羽可汗曾进行一系列政治、宗教改革，如重用粟特胡理财襄政、奖掖摩尼教、毁废巫教神像、裁黜巫师等。这些改革虽然促进了回纥社会的发展、进步，却损害了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同军勋贵族及巫教世家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由此而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宰相顿莫贺的政变夺权。《新唐书·回鹘传》载称：

德宗立，使中人告丧，且修旧好。时九姓胡劝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师向塞，见使者不为礼。宰相顿莫贺达干曰：“唐，大国，无负于我。前日入太原，取羊马数万，比及国，亡耗略尽。今举国远斗，有如不捷，将安归？”可汗不听。顿莫贺怒，因击杀之，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凡二千人<sup>①</sup>，即自立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使

<sup>①</sup> 此句《唐会要》卷九八作“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三千人”；《旧唐书·回纥传》作“并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凡二千人”；《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作：“会可汗顿莫贺新立，尽杀九姓胡人，皆畏惧不敢还。”

(酋)长建(聿?)达干从使者入朝。

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辛酉驾崩。癸亥,德宗即位。九姓胡乘机煽动牟羽可汗入寇。顿莫贺在力谏不果的情况下击杀牟羽可汗,以武力夺取了政权。九姓胡人的政治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摩尼教也倍受冷落。据缪勒于1913年发表的《K. A. D. W的摩尼教〈赞美歌集〉断简》一文介绍,该《赞美歌集》为两片回鹘文断简。第1片227行是“序言”,前半部(1~159行)是“对君主和他的整个家族及廷臣的祝福祈祷”;后半部(160~227行)是用“光明的使者(指教主摩尼)出生经过546年而到今天”等话语开始的。第183~188行称该书“一直没有写成,终以未完成的状况长年放在城中的住室内被保管着”。第2片从228行到445行是“内容目录”。缪勒推测该书开始写于761~762年,亦即牟羽可汗统治的初期。“祝福祈祷”部分曾提及aj tɛŋridɛ qut bolmɪʃ alp bilgɛ ujɬur qaɬan(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回鹘可汗;由aj祖先神得到福位的、英勇、睿智的回鹘可汗)以及tɛgin(特勤)、inal(伊难)、tarqan(达干)、tutuq(都督)。其中高昌的贵人姓jaɬlaqar(药罗葛),还提及jultuz baj tɛgin(裕勒都孜·拜特勤)。廷臣包括panzkand(=bɛʃ balɪq,别失八里)、cinanc kand(中国城,即高昌)、ark(焉耆)、kwc(=kuɬa,龟兹)、parwan(拨换)、wcwr(=uɬ=uɬ turpan,温宿)、kash(=qɛʃqɛr,喀什噶尔)等地的官吏。此前,学者们推测该可汗指昭礼可汗<sup>①</sup>或保义可汗<sup>②</sup>,笔者则认为当指牟羽可汗。首先,其称名正与《九姓回鹘可汗碑》粟特文部分正文第1行所载牟羽可汗的称名相一致;其次,内容也与牟羽可汗时期的史事相合:高昌的贵人姓药罗葛氏,牟羽可汗正属于药罗葛氏;昭礼可汗或保义可汗均出自跌跌系统,而且高昌是跌跌氏崛起之地。这期间,高昌的贵人不可能姓药罗葛氏。顿莫贺的政变夺权和对九姓胡人的迫害,当是迫使《赞美歌集》撰写工作中断的原因。

回鹘据有西州的初期,即790年秋至795年间,高昌地区的摩尼教由于得到了跌跌氏出身的骨咄禄的支持,曾有一段短暂的复兴,但不久便因骨咄禄皈依佛教而受到打击<sup>③</sup>。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执政后,摩尼教始再度复兴,摩尼师重新参与国事。《新唐书·回鹘传》称:“元和初(806),再朝献,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湏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也即是说,从779年至806年的二十余年间,高昌地区的摩尼教除有5~6年的短暂复兴外,一直处于低谷。

840年回鹘西迁后,摩尼教虽然继续受到尊奉,但在佛教兴盛的高昌地区已呈败落之象。王延德《西州使程记》称:太平兴国七年(982)时,高昌“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说明其势力和影响已远不及佛教。第二年,就在王延德离开高昌后不久,摩尼教便被明令取缔。据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获取的一件回鹘文

<sup>①</sup> [日]安部健夫著《西ウイグル國史の研究》,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出版部昭和三十年(1955年)版,第218页。

<sup>②</sup> [日]森安孝夫著,耿昇译《回鹘吐蕃789—792年的北庭之争》,文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③</sup> 李树辉:《TM276号回鹘文写本有关问题辨正》,刊于《新疆文物》2007年第3期。

文书记载，高昌回鹘王子曾于Kjw'n pbr-liŋ kuu qojn jil（土星之癸未年，983年）奉可汗之命将城内的摩尼寺改建为佛教寺院，并明确指示“剥取拆除摩尼寺内的壁画、塑像，布置装饰佛教内容，改建成佛教寺院”<sup>①</sup>。与这件文书的记载相应，德国探险队亦发现了实物证据。勒柯克曾记述道：

农夫又引我们到城的中心，把一个比较建筑很晚的一个像厅似的建筑的薄墙拆破，在这较古的墙上，似乎一张很大的壁画的遗迹，绘着一个比人还大的穿着摩尼教士衣服的人，他的周围是一些穿白衣的男修道士（electi）和女修道士（electae）。这些像的胸前，很小地绘着他们用粟特字写的美丽波斯的名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摩尼教的教主摩尼的肖像。这图画形成我们收集物品中的主要物件之一。这个图画的发现，将摩尼教教堂（或宗教建筑物）没有用绘画装饰的观念打破，这厅或许是此著名宗教的“斋戒厅”之一。<sup>②</sup>

这幅绘有“摩尼教的教主摩尼的肖像”以及男女修道士肖像的壁画，之所以要用一堵薄墙遮蔽起来，应与高昌回鹘可汗取缔摩尼教的诏令密切相关。勒柯克接着记述道：

有一个农夫告诉我，在第一次探险队来此地的前五年，他在一个庙的遗址中（那庙是拆毁了开田的），发现几大车的大字的写本，那种写本，就是我们现在努力搜求的。那些写本中，有很多用金的和其他颜色的图画装璜着。不过他开始是怕那文字不神圣的本质，后来又怕清政府藉口再加勒索，所以把它们都抛在河里去了！<sup>③</sup>

在一个遗址中能发现几大车的写本，而且“那些写本中，有很多用金的和其他颜色的图画装璜着”，表明该遗址曾是摩尼教的藏书室——用五颜六色的图画装璜图书正是摩尼教区别于佛教的显著特点。

摩尼教文献的书写材料和书式多种多样。有写在纸上的、羊皮上的、羊皮纸上的、软套皮上的和绸上的。封面多用艺术化的浮凸印花熟皮制成，有的还有穿孔的手艺，并且常有金的装饰。写本的书式，据勒柯克记述，约略有：古式的卷书、折叠式的书（叠成手风琴样的长纸页）、Pothi或印度式的书（一种狭长而方角的页，在一边穿一个或两个孔。二块稍大的穿孔木板和页上的相合，并且在二块之一的木板上绘着美丽的图画，用长的绳穿在孔中，把画绕着，以免书页散失）、欧装式书等类型。<sup>④</sup>

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写本大多使用摩尼文或回鹘文书写，间或也有使用突厥如尼文（runic）的，而语言皆为突厥语，具有典型的“n方言”特点。所谓“n方言”也便是“阿尔鸟语”，是原生活在阿尔乌（arbu）地区（怛逻私和巴拉沙衮之间）突厥化了的

<sup>①</sup> 该文书收藏于原东德科学院，编号为M112，最早于1985年由耿世民和克林凯特两位先生在《吐鲁番摩尼寺的毁灭》一文中予以刊布和研究（Geng Shimin、H. J. Klimkeit, *Zerstörung manichäischer in Turfa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Köln 18, 1985, pp. 7-11）；森安孝夫先生在《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大阪，1991年，第147-153页）一文中对文书重新进行了转写、翻译和考释。

<sup>②</sup> [德]勒柯克著，陶谦译：《吐鲁番旅游探险》，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德]勒柯克著《吐鲁番旅游探险》，第195-196页。

粟特人（又称作arḡular——阿尔乌人）所操用的突厥语方言。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称阿尔乌人通两种语言<sup>①</sup>。“阿尔乌语”实际上是受诸多“底层”语言（主要是粟特语）影响而形成的一类特殊的地域性变异——混化型的突厥语方言<sup>②</sup>。摩尼教写本的方言特点表明，应出自突厥化了的粟特人之手；而吐鲁番正是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区<sup>③</sup>。

遗址发掘时所呈现的景象表明，高昌回鹘可汗取缔摩尼教的诏令不仅被严格执行，而且由于受到摩尼僧人的抵制和反抗，还伴随有流血事件的发生。勒柯克记述道：

当我从黄土尘埃的堆中把门口的土掘开时，我看见一个佛教僧被杀的干尸，他的袈裟上全是血迹，全室堆积的摩尼教写本有二尺多高。黄泥水浸入纸上，将一切都粘着一起，加以夏季的酷热。所有的可贵的写本都变成黄土了。我拿了一些作为标本，将它们很小心地晒干，希望能够保存一点，但是它们干后就破成残片，那上面的美丽的线纹和交错着的金蓝的绿和黄的小图，还隐约可见。在此地我们失去了极大的宝藏。墙上也有极好的壁画，但是人的图画都被损坏了。进在这藏书处的一个窄道中，发现有极多的织物，其中有些是波斯的，有些是中国的，还有摩尼教的布上的画像，绣着一个穿法衣的摩尼教的男的或女的教士。<sup>④</sup>

在“全室堆积的摩尼教写本有二尺多高”的摩尼教寺庙遗址中，为何会出现被杀的佛教僧侣的干尸呢？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当这个佛教僧侣奉命去接收并改造该摩尼教寺院时，由于受到被激怒的摩尼僧人的抵制和反抗而死于这场冲突之中。此后，该摩尼教寺院因被官方封闭而逐渐废弃。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出土文献、遗址发掘报告和寺庙残存壁画来看，高昌回鹘可汗有关取缔摩尼教的诏令毫无疑问得到了严格执行。虽然也可能伴随有个别流血事件的发生，但作为对官方政令的执行，按常理来说，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屠杀惨案。然而，勒柯克的遗址发掘报告表明，确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屠杀惨案。他记述道：

在南部的圆顶建筑的一间中，我们称它为死尸所。在此有一极可怕的发现。这建筑的外门，用墙堵塞，圆顶部分地倾毁了，不过铺了一层新的拱式的底部，上面建一晚期佛寺，它的墙只有出地稍高的残址存在。我们可以辨认那些墙上的佛教的壁画遗迹，它们主要的是代表喇嘛教中的魔鬼。

当我们把各方面都观察以后，我们把底部掘开，看见古圆顶的遗迹，于是猝见数百个被杀堆积纵横的死尸。从他们的衣服来判断他们是佛教僧侣。上一层的都很完

<sup>①</sup> [喀喇汗王朝]Mehmut Qeŋgeri:《Tyrki tıllar dıwānı》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sup>②</sup> 李树辉：《阿尔乌（Arḡu）人和古代突厥语“n方言”》，刊于《满语研究》2003年第2期。

<sup>③</sup> 《新唐书·沙陀传》称：“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始，突厥东西部分治乌孙故地，与处月、处蜜杂居。……处月居金娑山之阳。”“金娑山之阳”指吐鲁番盆地，而处月（yīgil）、处蜜（yōmul）正是突厥化了的粟特部落。另，柏孜克里克石窟寺第32窟的粟特供养人像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宁戎乡的名籍也均可予以证明。

<sup>④</sup> [德]勒柯克著《吐鲁番旅游探险》，第197页。

整——皮肤、发、干眼、致死的伤痕，大半是全可以辨认的出。有一个头颅，被刀从头顶直刈砍到牙齿，为状更惨。<sup>①</sup>

勒柯克判断：“这可怖的事端的发生，大约在第九世纪中叶，同时也是城的毁灭时期，因为那时中国政府想对僧侣阻止，下一道命令，无论是基督教，摩尼教或佛教的僧侣，都必完全还俗，从事职业，结婚生子，纳税，并依照国法充当军人，违者处死刑。这儿必定也是同样的结果；敬宗教的人，宁愿死而不服从命令，于是这个惨剧就发生了<sup>②</sup>。”这番话显然为揣测之辞，并无任何根据。首先，“中国政府”9世纪中叶已无力过问西域事务，更不可能导演“这个惨剧”；其次，从被屠杀的数百人均均为“佛教僧侣”来看，导致“这个惨剧”的原因只可能是宗教战争。笔者推测，其发生的时间当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起因便是伊斯兰教的“圣战”。文献记称：

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曾经举行过圣战（ghazát）进攻契丹。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刺和卓和土鲁番，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这两个地方现在被称为“达尔·阿勒·伊斯兰”（Dar al Islam）。作为蒙兀儿诸汗的驻地来说，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仅次于哈实哈儿。此外，还有人说，在那次战役中，这个地区根据神圣伊斯兰教律的规定而被分割开。落在这位汗手中的是一片锦缎和一只灰牛。这位汗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伊斯兰教王国增光。<sup>③</sup>

史籍中有关对吐鲁番地区发动“圣战”的记载仅此一例，而该遗址中被屠杀的数百人又均为“佛教僧侣”。据此推断，勒柯克所记述的宗教屠杀惨案当就是这次“圣战”的恶果。关于“达尔·阿勒·伊斯兰”（Dar al Islam），王治来先生根据《简明伊斯兰百科全书》（荷兰莱登英文版，1965）注称：“它指的是这样的地区，在那里建立了穆斯林的权力，那里的居民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不信伊斯兰教的居民在那里要服从穆斯林的统治，没有完全的自由和权利。”从勒柯克的遗址发掘报告来看，当时的情况也正与此相符。该建筑的外门“用墙堵塞”，被屠杀的数百佛教僧侣被“堆积纵横”地封堵于该建筑底部，在倾毁了的圆顶部分又“铺了一层新的拱式的底部，上面建一晚期佛寺”，墙上的佛教壁画“主要的是代表喇嘛教中的魔鬼”。表明该建筑是在毁于战火后直接被改做公墓，并在上方修建了一座用于祭祀的灵堂。黑的儿火者汗为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子，在位时间为1389-1399年。据此推断，他对哈刺和卓和吐鲁番的“圣战”，亦即高昌地区的宗教屠杀惨案当发生在此期间。

## 二

通常认为，摩尼教自唐宝应二年（763）正式传入回鹘开始，至宋太平兴国八年

<sup>①</sup> [德]勒柯克著《吐鲁番旅游探险》，第198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983年)时止,在回鹘人中共流行了221年,此后便不复存在了。也有学者认为13世纪“摩尼教始不行于回鹘部族中”<sup>①</sup>,或认为摩尼教在回鹘人中“一直维持到11世纪的前数10年”<sup>②</sup>,或认为“回鹘摩尼教的最终消亡应在11世纪中叶或稍后不久”<sup>③</sup>。就东部地区的高昌回鹘汗国而言或许如此,但摩尼教并未至此消亡。有迹象表明,该教一直延续至18世纪。在以波斯文撰写的,记述16世纪以艾哈迈德·卡桑尼为尊号而闻名于中亚的苏非大霍加买合杜木·艾扎木及其长子依禅·卡朗家族几代著名霍加生平的《大霍加传》手抄本中,便有数段文字记载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的摩尼教徒活动情况。兹摘录如下:

当时,喀什噶尔的民众分为几大派,一些人崇信伊斯哈克外里;一些摩尼教徒崇敬蒙古人;还有一部分人崇拜其他人物。他们经常搜集对方的情报。所以,弟子们运回灵体,秘密地安葬了萨赫甫卡朗。<sup>④</sup>

买吾拉乃·艾卜·纳斯尔又备尝了摩尼教徒的折磨。异教徒在他头上套了一种器械,在两只手上套上了似手铐又非手铐、似铁链又非铁链的一种东西,使他受尽了痛苦,后又把他押到伊犁附近的一个山区,交给了一位名叫吐兰的人,吐兰问:“你是何人?”他答说:“我是萨赫甫卡朗的人。”吐兰听后,二话没说,便把他交给了一位蒙古人,后来,一位名叫黛尔开穆巴依的人又从蒙古人手中将他买了出来,其身价是几匹布,几件长袍,几匹马。在同一时期,买吾拉乃·多斯提来到叶尔羌后,亦被摩尼教徒套上了器械,受尽了千辛万苦,被解送到伊犁,交给了吐兰。吐兰问:“你是何人?”答曰:“我是萨赫甫卡朗的人。”吐兰听后,二话没说,也把他交给了一个蒙古人,后来,黛尔开穆巴依赎回了他。艾卜·纳斯尔和多斯提两人深受黛尔开穆巴依的款待。<sup>⑤</sup>

有天,我们在乌帕尔村时,我住在买吾拉乃·德里穆的舍下,有次,德里穆说:“我去叶尔羌时住在阿不都许库尔伯克的府上,一天教友请我赴宴,我去后,他让我坐在上座,接着又来了几位客人,我们一起聊天,其中,有些是摩尼教徒。当谈论到白色与黑色时,多数人倾向于白色,并对白色大肆赞赏。显然此话是针对我们而来。于是我便对他们说:‘你们听着,仁慈的真主赐毕拉勒(人名)喜爱黑色,赐仙女喜爱白色和美丽。后来,仙女们对毕拉勒这样的埃拜西人(埃拜西人即现在的埃赛俄比亚人——译注)总是不顺眼,万能的真主于是又把毕拉勒的黑颜色分给了仙女一部分,从此仙女们的美容又比原来漂亮了一百倍。黑白的缘由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们需要详细了解的话,就请你们看一看《色叶尔》这本书好了!正如人的眼帘是白色的,而眼球却是黑色的一样。请你们想一想,究竟哪种颜色优越些!’我这一席话,说得那些摩尼教徒张口结舌,低头不语,大杀了他们的威风。”<sup>⑥</sup>

<sup>①</sup>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京都,1931年,第164页。

<sup>②</sup> [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7页。

<sup>③</sup> 杨富学:《关于回鹘摩尼教史的几个问题》,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sup>④</sup> 崔维歧译,宝文安、王守礼校《大霍加传》,《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第71页。

<sup>⑤</sup> 同上,第72页。

<sup>⑥</sup> 崔维歧译,宝文安、王守礼校《大霍加传》,《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第79页。

上引第一段文字称“当时，喀什噶尔的民众分为几大派，……一些摩尼教徒崇敬蒙古人”，可知这些摩尼教徒（亦即文中所说的“异教徒”）必是当地的维吾尔人。同书记载，萨赫甫卡朗生前曾打着“去伊斯兰故乡周游”之名，在忽毡等地“招募了大队人马，来到喀什噶尔同异教徒交战，杀死了许多异教徒，收复了叶尔羌，把异教徒赶到了阿克苏以外……此后霍加阁下在叶尔羌坐朝两年，后又登上了喀什噶尔正义之位”<sup>①</sup>。虽则如此，当地的摩尼教徒仍有相当的数量，而且势力强大，以致于直到萨赫甫卡朗死后连安葬其灵体都得“秘密地”进行。

《大霍加传》的作者及撰写时间不详，现存手抄本是英吉沙罕阿勒克村毛拉阿不都拉·本·毛拉尼牙孜于伊斯兰历1280年12月（清同治三年四月，1864年5月）抄写的。书中记述了阿帕克·霍加之子“萨赫甫卡朗阁下归真”三年后的史事<sup>②</sup>。同时记载了萨赫甫卡朗死于伊斯兰历1138年（=1725年）1月27日夜<sup>③</sup>。该书作者五六岁时曾“见过萨赫甫卡朗的四位弟子，聆听过他们的宣讲”<sup>④</sup>，而且有关伊斯兰教徒和摩尼教徒关于白色与黑色的辩论，便是一位名为买吾拉乃·哈吉的人亲口对时年十七八岁的作者讲述的。据此推测，该书当完成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也既是说，至晚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摩尼教仍然存在于西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而在阿克苏及其以东地区，由于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摩尼教徒被“赶到了阿克苏以外”，极可能还延续过一段时间。

### 三

由上可看出，东部地区摩尼教的消亡应与高昌回鹘王国的禁令相关，而西部地区摩尼教的消亡亦即摩尼教的最终消亡，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维吾尔族至晚在15世纪末便已实现了全民的伊斯兰化。据此看来，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和北缘（或许也包括南缘）地区应是摩尼教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上引《大霍加传》的文字应是有关摩尼教存世的最后记载，有助于澄清这一史实。就这一点而言，该书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 李建欣）

<sup>①</sup> 崔维歧译，宝文安、王守礼校《大霍加传》，《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第47页。

<sup>②</sup> 同上，第72页。

<sup>③</sup> 同上，第79页。

<sup>④</sup> 同上，第77页。